

## 論《國史大綱》與政體演變

### 一 錢穆先生的歷史精神

民國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抗日戰爭爆發，錢穆先生從北平撤退至西南大後方，此時是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時節，錢先生手頭資料不充足，地處僻陲的情況下完成《國史大綱》。時至今日，很多學者以「一生為故國招魂」來形容錢穆誓承接傳統文化的氣魄。筆者有幸畢業於錢穆先生開辦的新亞研究所，自涉獵中國歷史開始，已是以錢穆先生的作品作引導。本文不獨為錢先生搖旗吶喊，且滿懷對家國之感情，在這史學發展至歧路的情況下，再加思考。

《國史大綱》幾成為亡國者的作品，若說此書的重要，我會以司馬遷完成《史記》的心來形容此書：

蓋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臍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；《詩》三百篇，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、思來者。乃如左丘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...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<sup>1</sup>。

上列每部流傳後世巨著的作者都是處身憂患逆境中，幾置於喪命無助之境，才能完成偉業。錢先生處身的國家環境，正正是存亡之際。他寫《國史大綱》時的矛盾：「抑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，必將執吾書之瑕

<sup>1</sup> (漢) 司馬遷：《報任安書》，見(漢)班固：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排印本，1964)卷六十二，頁 2735。

疵，以苛其指摘，嚴其申斥，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、薄通業者之燄，而為國史前途之罪人。抑思之又思之，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，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。」<sup>2</sup>錢先生希望振奮國人對國史的興趣，從中認真了解中國為何有當時的國勢及社會現象。他推崇司長光，退而著作《資治通鑑》，政治上不能發展自己的抱負，就以著史將自己對家國的期望與見地，表達出來，可謂費盡心神，無非重新興起國人對國家的信心。錢先生說：「史學在中國，一向成為一支盛大光昌的學問，中國人一向看重史學，可謂僅次於經學。」<sup>3</sup>

幾千年的歷史，沒有間斷，《國史大綱》貫徹中國各方面整體的發展與變遷，中間闡述其變遷的原因，發展的利弊，可謂別具心得卓見。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說：「欲知大道，必先為史；欲滅其國，先毀其史。」<sup>4</sup>。國史之重要，關乎國亡家破，不可不慎。當年出版，遇到阻礙，有論者認為偏頗，偏重愛國思想，殊不知生死存亡之間，借此喚起國民對中國的信心，是難能可貴，是真知卓見。

王晴佳曾在《台灣史學五十年》：

1960 年代以後，錢穆在台灣學術界和史學界的影響也日漸顯著，其突出標誌就是錢穆的《國史大綱》，從那時以來常被各校歷史系用作大一的通史教材。對那些初入史學之門的莘莘學子來說，錢穆的文字顯得有些古奧，對書

<sup>2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〈引論〉(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)，頁 33。

<sup>3</sup> 錢穆：《中國學術通義》(台北：學生書局，民 66)，頁 14。

<sup>4</sup>(清)龔自珍：《古史鈎沉論》。

中所闡述的微言大義和時世背景也不甚了了，但作為他們進校以後所接觸的第一本專業歷史書籍，其思想影響可以說是潛移默化、細長久遠。...

錢穆《國史大綱》成書於抗戰期間，自出版即佳評如潮，顧頡剛在《當代中國史學》中說此書是當時所有通史著作中創見最多的，1947年嚴耕望出版《治史答問》，在書中稱讚此書，「章節編製與一般通史書迥異，內容尤多警拔獨到處，往往能以幾句話籠照全局，精悍絕倫」，而此書在戰後台灣的歷史系課程，特別是在中國通史課堂上，《國史大綱》仍是重量級的讀物，延續至今，依然如此。<sup>5</sup>

《國史大綱》是台灣入讀大學第一本對中國歷史全面介紹的書籍，嚴耕望先生稱贊是「內容尤多警拔獨到處，往往能以幾句話籠照全局，精悍絕倫」。

錢先生曾擔憂中國歷史如何走下去？他曾問章太炎：「現在是廿五史，下邊該怎樣？」章太炎沒有答。錢先生說自《尚書》後有《春秋》，自《春秋》後過約一千年有《史記》，自《史記》後二千多年，從沒間斷，原因在哪？中國人！應好好思考此問題<sup>6</sup>。中國人歷史的路，又該如何走下去？

筆者自中學始，已看錢先生的《中國歷史精神》、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等著作。本文將先論錢穆先生對中國歷史的信念，繼而以錢先生所說政體三級演變：由封建而躋統一；由宗室、外戚、軍人所組的政府，而為士人的政府；由士族門第再變為科舉競選等討論中國歷史精神。此三項，實具中國歷史的發展獨特形式，亦是搏成現代民族的原因。學者往往對此三項有不同的見解，當然有批評錢穆先生所論斷者，本文無意羅列分析，只介紹錢先生對史學的見解。

<sup>5</sup>王晴佳：《台灣史學五十年》(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2)。

<sup>6</sup>錢穆：《中國史學名著》(台北：星星出版社，年缺)，頁 60-61。

## 二 讀國史的信念

錢穆先生在《國史大綱》開宗明義說出國史的重要<sup>7</sup>：

1.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，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，對其本國已往歷史，應該略有所知。(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，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。)
2.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。(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，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。)
3.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，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，(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，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。)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，(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。)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，一切諉卸於古人。(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。)
4.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，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。(否則其所改進，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，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。換言之，此種改進，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，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，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。)

錢穆先生鄭重的說，國人必須對國史有基本認識。讀中國歷史，要對國家歷史有溫情，有尊敬的心。每個歷史時期也可能出現暴政或外來民族的壓迫，都有著他的時代因素，我們不應因此而對中國幾千年文化而產生懷疑，甚至厭

---

<sup>7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1〈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〉。

棄。現時處於弱勢的國家，不等於以往的歷史毫無價值，反之，要思考古往今來變遷的因素。不可因此而對古史譴責或自譴。倘國人對本國歷史有認識，這亦是國家興起之始。筆者自少聽老師說歷史故事，每每對古代聖賢悠然生尊敬之心。

其次，是要分清楚「歷史知識」與「歷史資料」的分別。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，是為歷史。記載此活動的材料是歷史的材料，而不是歷史的知識。錢先生強調：「材料累積而愈多，知識則與時以俱新。歷史知識，隨時變遷，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，有親切之聯絡。歷史知識，貴能鑒古而知今。至於歷史材料，則為前人所記錄，前人不知後事，故其所記，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。」(見《國史大綱》·引論)後來的學者必須從歷史材料中，尋求歷史知識，若放棄歷史材料，而妄稱史識，無疑癡人說夢。結論是「史識」必從「史料」始。讀歷史而沒有史識，若只在材料上打滾，是本末倒置。

錢穆先生分析中國歷史的特色：

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，舉其特點有三。一者「悠久」。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。從古竹書紀年以來，約得三千七百餘年。(夏四七二，殷四九六，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，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。)

二者「無間斷」。自周共和行政以下，明白有年可稽。(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，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。)自魯隱公元年以下，明白有月日可詳。(春秋編年從此始，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。魯哀公卒，左傳終，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。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，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。)

三者「詳密」。此指史書體裁言。要別有三：一曰編年，(此本春秋。)二曰紀傳，(此稱正史，本史記。)三曰紀事本末。(此本尚書。)其他不

勝備舉。(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。)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，所含民族分子最復雜，因此益形成其繁富。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，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，則我華夏文化，與并世固當首屈一指。<sup>8</sup>

中國歷史特色有三：悠久、無間斷、詳密。這是本國史彌足珍貴之處，亦是有異於他國歷史的不凡處。故此，研究歷史是求其「異」及求其「同」。「求其異」是從歷史的狀態及特性而知道其變之所在，而看出整個文化的動態。再從此動態的暢遂與夭斃，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。「求其同」是尋找不同時代的「基相」。此各基相相銜接、相連貫而成一整面，此為全史之動態。<sup>9</sup>亦可謂民族發展的命脈。

中國歷史人事之間，以人為主，事為副，「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」<sup>10</sup>。人有賢奸，事有褒貶，褒貶乃中國歷史之要綱。撰寫歷史，就負起評定人物的責任，亦是定立民族道德方向的推動者。鄭樵撰《通志》要地下無冤魂，歐陽修評馮道是「其可謂無廉恥者矣」等，都是為社會的道德要求作前導。

### 三 由封建而躋統一

中國歷史自黃帝傳說始，有四千六百多年，可以用「悠久」來形容。由封建至統一，是趨勢。西周封建本是耕稼民族之拓展，與游牧民族本無衝突，因兼併出現，游牧民族承機侵擾。霸主之出現，除維護周天子顏面外，是穩定國與國之間的矛盾。宗法封建，漸漸趨向戰國時的新軍國，軍功亦代替貴族的專政。論者往往以「專制」評論中國政體，卻不知中國自秦漢以來乃非一家一姓之力能專制：

<sup>8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·引論》，頁 1。

<sup>9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·引論》，頁 11。

<sup>10</sup> 錢穆：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(北京：三聯出版社，2002)，頁 113。

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，不知中國自秦以來，立國規模，廣土眾民，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。故秦始皇始一海內，而李斯、蒙恬之屬，皆以遊士擅政，秦之子弟宗戚，一無預焉。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，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！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，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，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，終以告歇。<sup>11</sup>

錢穆先生認為，秦以前，可以用「封建統一」來形容，而秦以後，可以說是「郡縣統一」。<sup>12</sup>政權開放，平民弟子可因才能、軍功，晉身統治階層。同樣，社會上的井田徵稅方法，轉為「履畝而稅」。春秋時期的出現，文化上是一大成就。外交上文雅風流，戰爭中仍重人道、講禮守信。儒、墨兩家之興起，影響深遠。孔子從歷史的觀念出發，追隨文王、周公的禮法。從人道的觀念出發，提出天命、性、仁、孝、忠恕等觀念。墨家在理念上是反對儒家的禮、樂奢侈觀念。同時，亦反對儒家的其他觀念，提出「兼愛」、「天志」等理論。根據錢先生的理解，「以下戰國學派，全逃不出儒、墨之範圍」<sup>13</sup>。

錢穆先生說此演變，於秦漢已完成。此統一大業，亦非常壯烈。見於春秋的國家名字約五十多國，若以左傳紀錄計算則約百七十國。從列國內亂，戎狄入侵，如此則各地戰爭是無時無刻的發生。從戰國七雄，至秦統一天下，整個民族多在水深火熱中。

戰國二百四、五十年的歷史，出現一次貴族統一局面，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而統一。卻在短短十五年的統治期，由平民出身的漢高祖，開創史無前例的平民稱帝。西漢劉氏執政二百二十一年，新莽居攝十八年，再由劉氏掌政九十六年。

秦的統一，劃定了中國的基本版圖。其有功於後世者，廢封建、行郡縣、墮城郭、夷險阻、築馳道、建長城。最重要是統整各地有異的制度、文化、風俗，使中華民族形成初步面貌。錢先生認為，秦乃貴族敗氣的延續，是進入平民治國的過渡期。<sup>14</sup>

<sup>11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·引論》，頁 14。

<sup>12</sup> 錢穆：《中國歷史精神》，頁 20。

<sup>13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103。

<sup>14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127：「秦之統一與其失敗，只是貴族封建轉移到平民統一中間之一

漢之統一，制定稅、役、賦、貢的規模。農民出現土地所有權的觀念，繼而產生與統治者的臣屬關係，對國家又生義務感。

在此特別提出，封建至統一的歷程。封建，在中國歷史上最簡單的解釋是「封疆建土」，即分封。戰國時已出現郡縣制，秦統一，實行郡縣制。漢初立國，為便利統治，推行郡國制，文景以後，基本上地方封國已無實權。

試討論中西封建的不同。至於西方封建，主要分上古、中古和近代三時期。上古史是希臘和羅馬時期，中古史是封建時期，近代史是現代國家模式興起並發展。部份學者很籠統的說中國是封建社會，錢穆先生曾撰文闡釋。「封建」是日本人用來譯 feudalism 的，是馬克思用 feudalism 描述中世紀的歐洲。若據此來描述中國社會的發展，未免不大準確，往後很多學者更改原始「封建」的含義來解釋中國社會，例如將戰國至清代全稱古代封建。錢先生在《國史大綱》再申明此謬誤：

有告之者曰：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，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。”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，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。或告之曰：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，皆孔子、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。”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園，於孔、老之為人與其所言，固久已鄙薄而弗睹，暗而無知，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，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。或告之曰：“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，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，雖至今猶然，一切病痛盡在是矣。”於是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，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，莫不動色稱道，雖牽鼻而從，有勿悔矣。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，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、覆醬瓶，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。<sup>15</sup>

---

個過渡。」

<sup>15</sup>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頁6。



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可稱為「宗法社會、氏族社會，或四民社會」<sup>16</sup>，更闡明「中國自秦以下，即為中央統一之局，其下郡縣相遞轄，更無世襲之封君，此不足言『封建』」。 <sup>17</sup>更實言中國行宗法社會氏族社會，數千年未變。西方近代是民主政治，中國自秦迄清是皇帝統治，若硬說這是「專制政治」，未免強將西洋人的分類，加入中國歷史內。<sup>18</sup>

筆者數十年前亦因錢穆先生之言，於報章撰文分析東西方封建之不同。所得結論是歐洲自封建後，歐洲大陸未見統一，單以日耳曼民族來說分別成為挪威人、丹麥人、瑞典人、冰島人、德意志人、奧地利人、瑞士人等等。但中國自秦漢以後，基本上是統一的國家，足以證明兩者的發展完全不同。

#### 四 由宗室、外戚、軍人所組的政府，而為士人的政府

錢先生說士人政府完成於東漢此自西漢中葉以下，迄於東漢完成之有關士人政府的建立可參看〈第八章：統一政府文治的演進〉。秦、漢立國均以軍功為獎賞標準，成為政府的上層統治者。其次的官僚，多以郎、吏出任。無疑，新興的貴族階層仍是以出身為依據，有蔭任，指二千石以上，視事三年可蔭子一人為郎；貲選，指家貲滿五百萬，可為常侍郎；特殊技能，指戲車、善御、文章見用，地位多不被重視。

漢代的文治思想肇端於賈誼，他提出闡揚文教，針對時弊施政。其議論是從法律刑賞而轉向禮樂教化，由法而轉向儒家思想。

漢武帝從董仲舒之議，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建立士人政府之方有五，一是立五經博士，令學者從方技雜流漸次轉向從事研究政治、歷史的方向。二是公孫弘議立博士弟子員，此開文學入仕的途徑。三是郡國長官察舉屬吏之制度實行，建立士人有機會進入中央體制之途。四是禁官吏營商，裁抑兼併。五是打破封侯拜相之例，減低由一階層獨佔高位的局面<sup>19</sup>。自此以後，士人政府出現，公卿朝士，名儒輩出。錢先生對此現象的評價是「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、素樸的農民政府，現在轉變為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、有教育的、有智識的士人政府，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。」<sup>20</sup>

錢先生對漢武帝定立的選舉制度，有如此的見解：

<sup>16</sup>錢穆：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(台北：東大出版社，2008)。

<sup>17</sup>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21。

<sup>18</sup>錢穆：《中國歷史精神》，頁 26。

<sup>19</sup>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〈第八章：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〉，頁 144-147。

<sup>20</sup>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頁 149。

中國自漢武帝以後便變了。當時定制，太學畢業考試甲等的就得為郎，如 是郎官裡面，便屢進了很多知識分子，知識分子卻不就是貴 族子弟。至於考乙等的，回到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。<sup>21</sup>

漢代選舉之途有詔舉賢良方正，不定期煮及舉孝廉。應舉者，須參加中央考試，貴族與郡縣官吏均可推薦人材。如此，由中央至地方，均由知識分子治理，成就了士人政府，亦是大規模文人治國之始。

## 五 由士族門第再變為科舉競選

由士族門第變為科舉競選，錢先生認為此在隋、唐兩代完成之。秦漢以軍功為官，秦火後，平民任職政府，要以吏為師。漢代士人政府形成，是造就社會上以儒家道德為依歸的社會風氣。然而，此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之關係，逐漸建構出門第制度。錢先生認為士人政府在社會上的勢力表現在「清議」外，更重要的是構成「門第」。經學入仕，造成累世公卿的出現，鞏固了士族的勢力。地方察舉失去客觀標準，容易營私，請託報恩，層出不窮。錢先生形容此情勢，為變相的封建。

魏晉時，因察舉制度之逆轉，取而代之是「九品官人法」。此法當為權宜之法，初行尚有可取處。地方士庶可直求出仕中央，升遷之權操於中正的「品狀」。門第之勢已成，再立九品中正制，造成「上品無寒門、下品無勢族」的現象。高門望族，歷世為高官，寒庶則無寸進之途。繼之而學校與考試制度頹廢，中央無任人之權，太學如何能進才。錢穆亦謂此時期是變相的封建勢力。然而，門第自身力弱，以南朝士族為例，既不能奮勇對抗異族入侵，也不能重整王朝，推陳出新。南朝侯景之亂，可謂盡掃門第之氣數。

科舉設於隋代，隋文帝於開皇七年命各州「歲貢三人」，應考「秀才」。隋煬帝再設「進士」和「明經」科，為後世所沿用。唐代選仕有三途：生徒、鄉貢、制舉。所謂「制舉」無定期，州、縣貢舉卻每年一次，科目殊豐，除秀才、明經、進士外，又設明法、明算、一史、三史、開元禮等。由於科舉制影響中國往後過千年的選仕制度，故特補上定立制度時的資料說明，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十五〈雜記〉記：

<sup>21</sup> 錢穆：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4），頁 13。

唐高祖武德四年(621)四月十一日，敕諸州學士及白丁，有明經及秀才、俊士，明於理體，為鄉曲所稱者，委本縣考試，州長重覆，取上等人，每年十月隨物入貢。至五年十月，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，秀才六人，俊士三十九人，進士三十人。十一月引見，敕付尚書省考試；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，秀才一人，俊士十四人，所試通，敕選與理入官；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，充歸糧，各勤修業。自是考功之試，永為常式。<sup>22</sup>

所謂「貢舉」，指貢人與舉人二事。貢人指各州每年依規定貢上中央的應考者，即所謂「鄉貢」。舉人有兩種情形，一是別敕令舉，一是官學（含中央的國子監與地方府州縣學）學生每年呈報尚書省應考者。一般來說，唐代科舉分常科、制科，常科每年舉行一次，制科是由皇帝決定舉行日期。這樣的選拔人才，錢先生認為此乃立國的大憲大法：

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，無憲法。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，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，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，不必泥以求也。中國自秦以來，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，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，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。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，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，使得有參政之機會；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，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，則下情上達，本非無路。晚清革命派，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，固有效矣。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，謂自秦以

<sup>22</sup> 〈<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wiki/唐摭言>〉，瀏覽日期：2020年9月19日。

來，中國惟有專制黑暗，若謂「民無權，國無法」者已二千年之久，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。<sup>23</sup>

此制的用意，是以一客觀標準，挑選社會上的精英，參與國家的政治，消融社會上階級之存在，令社會文化向上。此制培植人民對政治的興味及提高其愛國心，成為一般平民出身及進入中央統治層面的制度。科舉制成隋唐至清代，公平選仕的制度。不受地方官吏限制：

此外則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，即申送中央，由尚書禮部舉行考試。考試合格，即為進士及第。進士及第便有做官的資格了。至於實際分發任用，則須吏部之再考試。<sup>24</sup>

同時，亦是平民預政的制度。過去千多年的科舉中，出現狀元七百多人，進士超過十一萬，不問出身，只問成績，是客觀與公平的選仕制度。

## 六 結語

國人要對國家產生感情，首先必須認識本國歷史，因認識而產生感情：

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，有其生力焉，亦有其病態焉。生力者，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。病態者，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<sup>25</sup>

我們對過往的光榮歷史，悲傷歷史要同樣有感覺，這是我們的國家。錢先生

<sup>23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·引論》，頁 15。

<sup>24</sup> 錢穆：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，頁 55。

<sup>25</sup> 錢穆：《國史大綱·引論》，頁 25。

說：「歷史便即是人生，歷史是我們全部的人生，就是全部人生的經驗。歷史本身，就是我們人生整個已往經驗。」<sup>26</sup>因此，歷史就是生命，生命不可能由半中間切斷，我們的今天，必定與昨天有關。<sup>27</sup>沒有了歷史知識，就沒有了民族生命。

錢先生的歷史理論，我在學時已有不同的學者表達不同的見解。科舉，是公平的考試，可惜明以後以「八股」形式進行，使士人思想陷入窠臼，甚至有學者認為明是亡於八股。然而，此論是集中其考試內容，而忽略了考試制度。就算是現代社會，較公平的考選，還是考試。

另一爭議頗大的是錢先生認為中國秦漢以來就有民主精神：

在中國史上，當封建制度之舊一統時代，即西周時代（下及春秋），早已有一種民主思想與民主精神，散見於群經諸子...，即秦漢時代，而中國人之民主思想與民主精神乃次第實現而具體化，制度化，成為一種確定的政治標準。<sup>28</sup>

此論在當代確是駭俗（錢先生語），他詳細解釋，約有兩端。第一是秦漢時代，王室已與政府對立。天子是皇室代表，宰相是政府的領袖，行責任制。錢舉例至宋代，闡明皇室行使王權，幾乎必須得到政府首肯才能實施。其二是官員的來歷，大體而言，除元、清兩代外，官員大都來自民間，故政府人員與王室關係，殊不深密，由何來君主專制？因此，錢先生得出的結論是「中國傳統政治，既非君主專制，又非貴族政體，亦非軍人政府，同時亦非階級專政」<sup>29</sup>

筆者在大學、研究所授課接近三十多年，每每看見有志於史學的同學則喜形於色，盡力協助。可惜的是無論大學抑或是社會，對推展歷史教學，毫不盡力。以香港為例，以往有數萬考生報考中國歷史，近年只得數千。正如錢穆先

<sup>26</sup> 錢穆：《中國歷史精神》（香港：人生出版社，年缺），頁 2。

<sup>27</sup> 同上註，頁 5。

<sup>28</sup> 錢穆：《文化與教育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，1977），頁 108。

<sup>29</sup> 同上註，頁 112。

生的疾呼，斷無不愛護本國歷史的民族，能長遠發展。

原載於《王汎森、黃兆強等主編《重訪錢穆》，台北：秀威資訊，2021。